

# 朱铭盘和他的《南朝宋齐梁陈会要》

顾吉辰

朱铭盘编撰的《南朝宋齐梁陈会要》，今北京图书馆收藏其稿本。它是记载公元四二〇至五八九年间“偏安江左”的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断代典制史籍。其内容主要取材于梁沈约撰修的《宋书》、萧子显撰修的《南齐书》、唐姚思廉撰修的《梁书》和《陈书》、唐李延寿撰修的《南史》以及魏征等撰修的《隋书》等。近人柳诒征曾对是书作出较高的评价。这部《南朝会要》虽非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第一流史学著作，但由于朱氏均取材传世史籍，分门别类，采撷成书，因此，它对于研究宋、齐、梁、陈四朝一百七十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以及文化制度方面，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本文仅就朱铭盘的生平事迹、编撰《南朝会要》的指导思想、内容特点及其存在问题，谈点看法，不妥之处，尚祈大家指正。

## —

朱铭盘，字曼君，江苏省泰兴县人。生于清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卒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壬午举人。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张裕钊传》云：

裕钊门下最知名者有范当世、朱铭盘。当世，字肯堂，江苏通州诸生，能诗，〔吴〕汝纶尝叹其奇横不可及，著

《范伯子诗文集》。铭盘，字曼君，泰兴举人，叙知州，其学长于史，兼工诗古文，著《晋会要》一百卷，《朝鲜长编》四十卷，及《桂之华轩诗文集》。

朱氏一生治史，“其学长于史”，这是不错的。但此处有三点是记讹了：其一，《清史稿》只记《晋会要》而不及《南朝宋齐梁陈会要》；其二，只举《朝鲜长编》而不及《四裔朝献长编》；其三，《清史稿》云朱氏“工诗古文”，朱氏虽能为古文，但其工力固不在此。章太炎为《桂之华轩诗文》作序云，其“少倜傥，善属文。既壮，事武昌张公，张公以古文辞著，而先生善为俚语，犹申耆出于姬传之门也。其文上规晋宋，下亦流入初唐，尝为鲁仲连碑，士庶传诵，有夏侯氏《东方像赞》风，其效初唐者，非其竭思之作也。”此为明证。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朱铭盘客吴长庆军幕。七年（一八八一）袁世凯以一个不第秀才来到吴长庆处，长庆嘱朱氏授以时文，袁世凯亦以师礼待朱氏。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朱氏以是年优贡，举本科乡试。复驰往山东登州吴长庆军中。这年六月，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乱。经过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开始萌生了夺取朝鲜，然后进窥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对此，客吴长庆军幕中的朱氏是有所警觉的，曾作《人日杂诗》，抒发了作者痛恨“倭奴”侵略的愤慨之情，诗云：

东海诸夷国，倭奴老不臣，公然荐藩国，况乃结强邻。

下濂戈船少，溟池水战新，更思前代事，奇计独何人。

朝鲜情势的急迫，清政府飞檄驻防登州的吴长庆率部赴朝鲜，朱氏亦随军至朝鲜。中间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入京会试，不第，仍回朝鲜汉城。次年吴长庆分兵，自统部分军队至金州。这时，朱氏对当时清政府的水师状况是很不满的。曾写下了“十万泰西铁，百万滇南铜”的诗句，表现了对于当时新兴海军的不

满。

朱氏对于当时所处的时代是有所知的。在吴长庆和他的幕僚正在准备回国的时候，中国方面留下王伯恭作为客卿。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吴长庆正在准备归国，王伯恭给他们送行，朱氏写《赠王伯恭》诗一首，云“天朝宰相宣帝化，新政徐徐规画之，曰美曰德曰英法，惟王一一相摹规。效此则强不者弱……。”吴长庆军队的入驻朝鲜，一方面支援了朝鲜，同时也是对日本侵略势力的打击，这是一次胜利。朝方留下王伯恭作顾问，朱氏叮嘱其必须学习英、法、德、美，“效此则强不者弱”，方可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朱氏没有从根本上看到清王朝已经走上灭亡的边缘。

光绪十年（一八八四）至十四年（一八八八）四年间，朱氏因事曾离开过金州，自光绪十四年起至十九年（一八九三）前后六年，在旅顺军中。由于朱氏多年生活在军队中，因此他对于清王朝军队的腐败，国事的螭蟾，都有直接的认识。他写下的《杂诗》三十首，简直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相颉颃。表现了作者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关于作者的主要著作也在这时期逐步完成。如果说朱氏一生四十二年，前三十二岁是才子，那末后十年为学者，为史学家。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朱氏第四次入京会试，依然还是名落孙山。失败后，他曾回到泰兴故乡，刻苦完成了《朱氏宗谱》的工作，每个木刻活字，都出于朱氏手笔。宗谱工作完成后，他重新回到旅顺。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同时长庆已经去世，他的继承者不但没有他的能力，也没有他的威望。这时的朱铭盘在张仲明部下充当幕僚，生活是痛苦的：穷愁的一身，身世的渐衰，国际形势的危急，寄人篱下的生活，都不断折磨着作者的心灵。此有诗为证：

穷海春回未似春，不成愁思细如尘，年过秦氏鬢鬢孀，  
诗写湘灵渺渺人。鹄有东南求好树，楼无西北接重国，怀仁  
辅义何人事，却怪桐江只钓纶。

少年南海弄潮儿，转眼高官得展眉，莫怪人思廉耻将，由来不值一羊皮。

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到作者壮志凌云的破灭；另一方面，可以看到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注定，无法挽回了。朱氏的敏锐，在于噩运到来之前，已经识破。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十一月十八日，朱氏病卒于旅顺军中。生平与军幕相终始，其功业无可见，而一生著述颇丰，足为后人仰慕。他呕心沥血完成的历史巨著《南朝宋齐梁陈会要》，更值得人们赞颂，它与《两晋会要》一起，填补了我国历代会要史体典籍的空白，为治南朝史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 二

朱铭盘编撰《南朝宋齐梁陈会要》有他一定的指导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首先，就是鉴戒史观。南朝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合起来统治不过一百七十年左右，政治军事情况极为复杂，各朝都有自己盛衰兴亡的过程。朱铭盘认为宋、齐、梁、陈的盛衰兴亡，都是可以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吸取的。正从这个鉴戒史观出发，他在书中通过《职官》、《民政》、《选举》、《食货》、《刑》等门类，着力记载了各朝开国君主的统治术。东晋孙恩、卢循的农民战争的风暴，士族挟主专横的情况，对宋武帝刘裕来说，都是历历在目的教训。所以刘裕称帝前后，杀了奴客纵横的京口刁逵，把刁氏成万顷土地和大量家财分给贫农；以后，又杀了隐匿人口的余姚大族虞亮，以图限制土地兼并。他实行“土断”以清理侨人户籍，废除一部分屯田池塞以赈百姓，禁止豪强封锢山泽。对此，朱氏在《宋会要》中，通过散见于各纪、传、志的有关史料，统一编排，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宋武帝、宋文帝父子相继统治时期，“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

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宋书》卷五四史臣语）的国泰民安的局面。又如作者在《梁会要》里对梁武帝萧衍的记载也证明了这点。梁武帝萧衍目睹宋、齐两朝宗室重臣内乱造成的危害，力图协调统治者内部的利益，避免内战。他为此改定北来士族的百家谱，以保障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东南士族则不在百家之内，另为一部。他下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人物，实际上是为士族地主和寒族地主开辟作官的道路。他还增设州、郡、县，增加文武官位，以安插求官的地主。官吏犯法的，他都暗示群下“屈法申之”。对贪污聚敛之人，只要不是造反作乱，都可以尽量优容。“武帝晚信佛法”，广建佛寺，用以笼络僧侣地主，麻醉人民。他又提倡儒学，制礼作乐，恢复太学，建立州郡学，以图粉饰太平。总之，梁武帝采取各种办法使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和不同集团都能获得利益，因而缓和了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减少内乱，欲使宋、齐两朝因宗室重臣内乱而造成相继灭亡的局面不再重现。对于梁武帝萧衍采取的上述统治术，朱铭盘在编撰《梁会要》时，考索纪传，钩沉索隐，并与书志记载的内容统一编排，纲目清晰，史实明了，为治史者提供很大方便。但是，在另一方面，朱氏对梁武帝的刑政残酷、镇压百姓，也作了无情的揭露。朱氏在《梁会要·刑律》门下说：“梁武帝承齐昏虐之余，刑政多僻。”又制定法律：“一人亡逃，举家质作”。在他的统治下，广大百姓处境更为恶化，农民暴动不断。据《文苑英华》卷七五四何之元《梁典总论》说：梁武帝时，“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辟行，……抵文者比室，陷辟者接门，膏灾亟降，图圉随满。”这种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必然导致萧梁王朝的崩溃。

鉴戒史观对国君来说是提供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对臣子官僚来说则重在褒善贬恶。朱氏在《南朝会要》里充分注意了这一点，他大力表彰循吏清官，无情鞭鞑奸佞酷吏。如在《宋会

要·食货》里，他记载了雍州刺史张邵开垦田地、发展生产的情况，说他“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开田数千顷，郡人赖之富赡。”又记刘秀之为梁、南秦二州刺史时，“汉川悉以绢为货，秀之限令用钱，百姓受其利。”如在《齐会要·民政》里，记齐竟陵王子良“好济挾贫”时说，“永明九年，京邑大水，吴兴偏剧”，其“开仓賑救贫病不能立者，于第北立廨收养，给衣及药。”又如对梁安成王萧秀，说他礼贤下士，“立学校，招隐逸”，提高了荆州一带的文化。记湘州刺史杨公则，说他“保己廉慎，为吏民所悦。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斩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诸州以为法。”（见《梁会要·选举》）

朱氏对侯景之乱的破坏性以及侯景的可耻下场作了充分的揭露。太清三年三月，原东魏降将侯景攻破台城，繁华的建康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被围饿死。接着侯景领军横行三吴，北折广陵，沿长江进江陵，在那里被萧绎击败，退返建康，自立为帝。侯景所至之处屠城洗劫，残虐无比，他的野蛮行径，引起南方人民的咬牙痛恨，到处起兵反抗。朱氏在《梁会要》里，通过《职官》、《民政》、《兵》等门类，逐一作了揭露和鞭鞑。

朱铭盘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后至甲午战争前夜的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对于南朝这个充满战争风云的时代里的循吏清官，怀有同情赞颂之心，对怀二心的人臣和导致山河破碎的乱臣贼子如侯景那样的人物，则十分痛恨。他四次入京考试不第，生平与军幕相终始。在长期的军幕生涯中，他由于种种原因未必能按照自己的标准褒善贬恶，而在编撰《南朝会要》时，因不致于触犯清政府的忌讳，采用记、志、传中所载的典章制度和史实，以类相从，分门编裁的形式，畅所欲言地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写作了。

其次，是正统思想。在朱铭盘的思想里，他认为自三国鼎立以后的两晋宋齐梁陈以汉人为主体的建立的封建政权，是中国统治

的核心所在。因此，他呕心沥血，仿照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体例，又取材于传世史籍，分门别类，采撷成书，编了《两晋宋齐梁陈会要》二百四十卷。在他这部稿本中，他对与之对立的北方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政权，如西魏、东魏等一概斥之为“虏”，纪元一概采用两晋南朝之纪元。他认为这些都是僭伪政权；对北朝国君很少称帝，大多称国主。在具体编撰《南朝会要》体例上，经按类编排，分为帝系、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乐、舆服、文学、历数、封建、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刑、方域、蕃夷等门类。以《宋会要》为例，以上门类下又置四百三十二事目。如在《宋会要·嘉礼·交聘》事目下，记事条计十九，完全以刘宋作为全国共主的真命天子地位加以记载的。如云：“普通初，魏遣彭城人刘善明诣京师请和。”又如云：“大同三年七月癸卯，东魏人来聘。”再如云：“太清二年六月，遣建康令谢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这些都是朱氏正统思想在编撰《南朝会要》时的反映。

再次，将清人留意的《南朝会要》未竟事业进行到底。会要是断代典制体史籍，作为一种史体，它始创于唐德宗年间的苏冕。宋初王溥根据苏冕《会要》、崔铉等人的《续会要》，并稽考实录文案，撰成《唐会要》一百卷，为最早传世的会要。《四库提要》卷八一说：“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核，……义例该备，有裨考证。”宋代特于秘书省设立会要所，专司会要之编撰，所成《宋会要》卷帙浩繁，于两宋典章制度及其沿革记录详博，惜散逸于兵燹，仅有辑文存世。继官修会要而起的是南宋徐天麟私人所撰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主要取材于班固的《汉书》和司马迁的《史记》等书，分门别类，编辑是书。清代乾嘉以后，私修会要者日多，在史学上的成果不能忽视。从现存的会要体史籍看，又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唐会要》、《五代会要》，都据实录文案董理而成，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且

易代成书，对朝政得失，讳言颇少。二是《宋会要》，系当时文书档案、臣僚奏言，交会要所分类汇编，保留原始资料最多。三是私人所修会要，撰者考索群书，钩沉索隐，往往集有关史料于一书，查阅甚为便利。尽管三种会要资料来源尚有不同，但门类、体例、性质、内容同属一源，对查阅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方面的史料十分方便。《四库全书总目》盛赞徐天麟与颜师古一样同为“《汉书》功臣”，正是指《西汉会要》这书的价值而言。

关于编撰《南朝宋齐梁陈会要》者，自乾嘉开始，曾有数人留意，但他们之中由于各种原因，总未完成。朱铭盘继承了他们未竟之业，不计辛苦、不辞烦琐，怀着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把散见于《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等正史中的帝纪、传的典章制度方面的资料爬梳董理，并与各书志记载的内容统一编排，终于在他离开人世之前初步完成了《宋齐梁陈会要》的稿本，做了前人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业，在我国历史典籍的百花园中开出了一朵鲜花。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朱铭盘《宋齐梁陈会要》稿本为底本，参照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和《南史》，逐条进行了校订，出版后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欢迎。

### 三

朱铭盘编撰的《南朝宋齐梁陈会要》有着许多明显的优点，是治南朝史者不可忽视的。

首先，它吸收了正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以及《隋书》等撰史长处。今以《宋书》为例剖析之。《宋书》一〇〇卷，梁沈约撰。《宋书》诸志，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沈约自己说：“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

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其有阙漏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魏书阙志，……自魏至宋，宜入今书。”并且说这一办法也是沿袭别人，“天文、五行自马彪以后，无复记录，何书自黄初之始，徐志肇义熙之元，今以魏接汉，式遵何氏。”（《宋书》卷十一《志序》）可见，沈约的《宋志》三十卷是沿袭何承天而加以多方面的补充而修成。关于沈约《宋书》这种追溯上代的做法，虽后人如唐刘知几、宋晁公武、明末顾炎武等人多有不同看法，但宋志上溯三国，既是补阙，又用以溯源，是很可嘉的。《州郡志》据太康地志及何承天、徐爰旧本加以修补，在地理沿革和户口统计之外，还记录了侨郡县的分布情况，远比《晋书·地理志》为优胜。朱氏《宋会要》辟有《方域》一门，下列《郡国分合省图》《宋末二十二州》等事目，将其十分复杂的地理沿革作了科学的编排，读后十分清晰明了。在《宋书·乐志》中，“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宋书》卷十一《志序》）由于它记录了汉魏以来的诗歌，因此成为研究文学史的良好资料。《宋会要》则专门列有《乐》门，将散见《宋书》等典籍中本记、列传、志部的有关内容统一编定，读后给人启迪。《律历志》详细记载了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的全文，可概括体现了当时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宋会要》则列有《历数》门，将各纪、列传中的有关史料集中一起，并与书志记载的内容统一编排，为治史者提供方便。沈约说：“刑法、食货，前说已该，随流派别，附之纪传。”《宋书》没有食货和刑法志，朱氏则在《宋会要》里专立食货、刑法二个门类。如《宋书·孔灵符传》详细记载了有关徙民之事，《何尚之传》记载了关于钱帛的议论，《羊玄保传》记载了占山湖之科，《周朗传》记载了贲课的危害等等。《宋会要》则将纪志传中的有关史料爬梳董理，按时间次序统一裁编，重点

突出，制度沿革清楚，给研究者带来方便。值得一提的是，《宋书·百官志》它在我国传世的二十四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对我国历代官制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朱铭盘编撰的《宋会要》设立《职官》门。它的份量约占《宋会要》全书的五分之一，下列太宰傅保、相国丞相、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直至名讳、牋奏章表、遥授蛮夷官号等九十七条事目。作者把散见于各帝纪、律历志、礼志、百官志、符瑞志、传以及《南齐书》、《南史》、《隋书》中的有关职官制度的史料约一千三百余条，分类按时编排、查检便当，能为研究者提供线索，也为初学者指示门径，不可多得。

又如《陈书》三十六卷，唐姚思廉奉敕撰。它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少，缺点也不少。正如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七中说的，它存在避讳处多的毛病。但《陈书》也有着明显的优点。南朝末年，特别是梁、陈之际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土豪，他们是“郡邑岩穴之家，村屯坞壁之豪，剽掠以致强，恣凌侮而为大”。所谓“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不遵朝宪。”（《陈书》卷二十《华皎传》）福建土豪陈宝应，“一郡兵权，皆自己出”。（《陈书》卷三五《陈宝应传》）这类情况在《陈书》中记载颇多，它是当时历史现实在作者头脑中的必然反映，作为一位严肃的史家，也必然将此特有的历史产物忠实地记下。六朝时长期存在的世兵制在不少人的传记中得到反映，对于这种历史制度的残存痕迹，当然更可从《陈书》中看到大量有关募兵的资料。这类情况正是反映社会历史在不断发生变化和向前进步。对此，朱铭盘在编撰《陈会要》时也及时捕捉了，他不计辛苦地将分散在《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隋书》中的纪、传、志中的有关资料逐一编辑，按时序、性质，内容编排，设立《兵》门，从中使人们看到六朝以来我国兵制的沿革变化，为研究兵制者提供很大的方便。

其次，突出编写经济、选举、文化方面史书的特点。《南朝宋齐梁陈会要》都列有《食货》、《选举》、《文学》等门类。属于经济方面的，朱铭盘通过分散在纪、志、传中的有关赋税、农业、手工业、国内外贸易、土特产品、货币的铸造与发行、河渠水利、物价食品等等内容，集中起来，设立《食货》门。在其门下，又视内容性质，具体列有：垦田、公田、屯田、占田、租税课调（杂税附）、督劝农桑、御供（食品附）、土贡、粮运、仓屯、盐铁、国用、府藏、献奉、捕采、钱、银、换资、酒、山泽邸舍、河渠、物价、富人输粟等二十三个事目，一百四十七条，内容充实，记事详细。如对孝武孝建元年更铸四铢钱事，作者从《颜峻传》中全文引载了当时臣僚对此事的议论，达一千七百余字，此在《南朝会要》中亦不多见，足见作者对食货的重视。杜佑在《通典》书序中说：“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朱铭盘也跟杜佑一样，认识到社会经济对政治、文化的重大作用；在社会经济中，又注意到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此，朱氏在《食货》门中，先述田制，次谈赋役、杂税、国用、货币流通，涉及到了生产和流通的整个过程。属于文化方面的，作者将分散在纪传志中显得零碎割裂、不容易看出全貌的有关文化史料集中一起，使宋、齐、梁、陈四个王朝有著作的文士大夫都记其著作的书名和卷数，从而看出南朝文化发达的情况。又如记载了南朝宋齐梁陈各朝的风俗习惯、宗教流行情况，尤其是佛教的情况。在他的《文学》门里，设有帝学、侍讲东宫、东宫校书、国学、州郡学、诸学馆（私学馆）、国史、敕撰史书、生立史传、诸王讲读、藏书、献书、经学家、诸家著述（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小学类、正史类、古史类、杂史类、霸史类、起居类、仪注类、杂传类、地理类、谱系类、目录类、道家类、杂家类、小说类、兵家类、天文类、历数类、医方类、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佛

教等十五事目，其中关于诸家著述事目中，作者通过《隋书·经籍志》以及有关南朝正史，编排经、史、子、集各种文献书籍达三百四十余部，对作者如此重视文化的社会史观是值得肯定的。属于选举方面的，以《梁会要》为例予以说明。由于梁武帝萧衍亲眼看到宋、齐两朝的灭亡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稳定性和争权夺利所致，因此，当他上台后，采取各种办法来协调统治者内部的利益，避免内战的发生。而选举取士则是他使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和不同集团都能获得利益，因而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减少内战的一项十分有效措施。姚思廉在撰《陈书》时，充分注意了这点。朱铭盘编撰《陈会要》时，设立《选举》门，将梁武帝选举取士的种种办法专门开具列出：选举例、徵聘（州郡徵聘）、策试（国子生）、通籍、年贯、皇子、皇孙、王子、嗣王、宗室子弟、主婿、外戚、嗣侯、功臣子弟、素族士族甲族、特敕、特辟、特荐、辟召、先代耆旧、故府僚属，勋旧、孝行、义行、孝廉、秀才、经学、文学、文赋称旨、清茂、良吏、吏幹、武用、军功、自请从军、上书言事、童子、拔虏还本，接对北使、寒门诸府吏、北国降人、荒人、阉人等计四十五条事目。通过这些事目及其所载内容，完全可以看到梁王朝在稳定政权方面是下了一番苦功的，辟官的途径也是名目繁多的，在我国历代王朝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再次、《南朝宋齐梁陈会要》在编撰体例上，也吸取了前人撰史的优点，凡引自正史之文均作正文，每条史料均注明出处。另又如依宋徐天麟所撰《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之例，凡一事而有不同说法的，选择一种写入正文，其余则采用注文形式写在正文之下，并说明正文的依据。如《宋会要·职官·恩赐·赐给使》条下云：“给亲信”。注云：“金紫光禄大夫谢庄、右光禄大夫张永，左王敬弘并二十人。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三十人，《南史》作二十人；王敬弘，《南史》作三十人”。《宋会要·

文学·目录》条下云：“《今书七志》七十卷，王俭撰。”注云：“《南史》本传作四十卷”。又如《齐会要·舆服·车》条下云：“皇太子象辂”。注云：“同上。（即指《南齐书·舆服志》）《南史·王俭传》，齐台建，世子车服悉依东宫制度。”《齐会要·文学·杂传类》条下云：“《海岱志》二十卷，齐前将军记室崔慰祖撰。”注云：“《隋书·经籍志》。下同。本传，起太公迄西晋人物，为四十卷，未成。”《齐会要·文学·礼类》条下云：“楼幼瑜著《礼据拾》三十卷。”注云：“《南史·刘焯传》、《徐伯珍传》，楼幼瑜著《礼据遗》三十卷。”朱铭盘对正史失载之处，则加以指出说明。如《宋会要·帝系·宗室世次》条下云：“金紫光禄大夫思考。”注云：“遵考从弟，史失父名。”对正史记载中的一些不惑之处，则用案语加以注释。如《梁会要·职官·公文·牒》条下云：“邵陵王临丹阳郡，因鲍邈之与乡人争婢，议以为诱略之罪牒官。”注云：“《南史·昭明太子传》。案《官》，即太子官。”足见朱铭盘在编撰《南朝会要》时对待史料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朱铭盘的《南朝宋齐梁陈会要》优点固然很多，但此书毕竟还是一部尚未最后完成的书稿、或许朱晚年精力不及，有不少地方欠加工修改，因此书稿错、舛、衍、脱之处也不少。一九八四年、八五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南朝宋会要》、《南朝齐会要》、《南朝梁会要》、《南朝陈会要》，是以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朱氏《南朝宋齐梁陈会要》稿本为底本，参照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逐条进行了校订和补充。归纳起来，朱氏之稿本有如下六方面的问题。

其一，有着狭隘的民族偏见。原稿本上凡称谓北方之东魏、西魏者，一律书写成“虏”，今据以全部改回。

其二，原稿本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有门而无目，有目而

无门，一事数见，有目无文，门与门，事目与事目之间互相抵牾等等，都一一予以订正。

其三，时序颠倒、窜乱，事目前后重出。整理时逐一调正和理顺。

其四，抄录史文时，出现的错、讹、衍、漏文字，均详加补正。

其五，对一些门目该载而作者失载的，整理者视内容性质，从散见各处的典章制度方面的资料，进行梳理考实，然后重新编排，作了一定的充实。

其六，作者不少诏令制诰没有全文抄出，整理时均逐字据正史原摺补上。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